

當代澳門透視

◎ 郭濟修



清代澳門透視

◎ 郭濟修

編輯

本館由澳門基金會贊助出版



二〇〇九年六月

當代澳門透視

作 者 郭濟修

執行編輯 《九鼎》月刊編輯部

出 版 人 郭濟修

封面題簽 程祥徽

封面設計 劉 毅 語 寒

排版製作 九鼎傳播有限公司

澳門宋玉生廣場335號獲多利中心21樓

發 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馬路32號G地庫

版 次 2009年6月第一版印刷

印 刷 珠海市日強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數量 1000本

定 價 澳門元 80元

ISBN 978-99937-708-7-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鄭志門與為前

鳴謝

本書由澳門基金會贊助出版



基於學術自由和文責自負的原則
書中內容並不代表澳門基金會的立場

序

雖然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語），然而，史學者在選取敘述對象時，似乎都流露出“厚古薄今”的共同偏好，生動活潑的當代史往往寂寞地留存在史學研究的視野之外。澳門的情況亦不例外。在眾多的相關歷史著作中，明清時期的澳門歷史得到比較深入透切的探究，但晚清以後，特別是民國以來的澳門史，受關注程度則甚為遜色，研究顯得相當膚淺薄弱，至於澳門當代史研究成果更是鳳毛麟角。

誠然，以史為鑒是我們的座右銘。但是，對於當今社會來說，需要借鑒的不僅是古代歷史，從直接的可借鑒性看，當代史研究無疑更具現實價值，因為當代，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澳門歷史，與我們當下的生活息息相關。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現今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無不呈現出那段歷史的真切影響。設想如果沒有1974年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便沒有《澳門組織章程》，也沒有事實早已存在但法律從未正式確認的澳門自治地位；如果沒有《澳門組織章程》，也不會有政治民主化的開端，不會有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如果沒有1979年的中葡建交，便不會有澳門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不會有澳門經濟的快速成長和城市的現代化。至於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的簽訂以及次年澳門過渡期的來臨、1993年《澳門基本法》的頒

佈和1999年澳門政權的平穩順利交接等重大歷史性事件，無不正面直接地影響著今時今日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

遺憾的是，我們對三十多年的當代史仍然缺乏全面、系統、客觀、細緻的考察和審視，對澳門急速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認知，並因此而影響到對當今澳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現象和問題及其來龍去脈進行有深度、有價值的邏輯分析，對其前因後果亦缺乏應有的了解和把握，在那段並不久遠時期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以及許多重要人物甚至已經逐漸為我們所淡忘，換言之，歷史似乎開始斷裂，以致於我們在日常政治社會管理中，因為沒有足夠重視和用心吸取那段歷史留下的珍貴經驗，一而再、再而三地承受一些或可避免的社會代價。

有人說，一個不尊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也不會是一個有尊嚴、受敬重的民族。作為歷史學者，對前述種種現象，即使未必驚詫，卻也不無慨歎。之所以不以為怪，是因為在澳門，人們習慣了口傳歷史，許多廣為人知的事實都沒有形成文字，令慣於尋求確證的史學研究者不無困惑。之所以慨歎，是因為我們未能重視與記取不久前處理某些事件的經驗與教訓，而令社會發展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此一狀況，與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格格不入，與我們弘揚歷史文化傳統的努力背道而馳，也與澳門在世界和區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唱對台戲。不是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嗎？難道我們不再需要歷史這面鏡子了？如果我們呼籲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如果我們要重構城市的集體記憶，如果我們要弘揚澳門的傳統作用，那麼，對於當代鮮活的記憶，又豈能不倍加珍惜呢？！

近年來，忽視當代澳門史研究的問題儘管不時為人提及，但依然缺乏應有的關注與實際的行動，更遑論顯著的成果。郭濟修兄作為新聞記者和編輯，不但活躍在歷史的現場，親歷與見證歷史，也善於記錄歷史。在整理記錄的基礎上，他參閱了該段時期的報刊和檔案文獻，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寫出這本書，令人感到欽佩。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這不是一部嚴格規範的歷史學術書，但通讀這部著作後，讀者肯定會發現這也不是一部個人色彩濃厚的見聞錄，更多是兩者奇妙的結合。所以，這部書讀起來非常輕鬆，也非常親

切。閱讀這部著作，溫故而知新，毫無疑問，對我們了解三十多年來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演變的脈絡及其邏輯不無裨益，對尋找解決當前我們所面對種種問題的策略不無助益，對探索澳門未來的發展之路也很有啟迪。

當然，我們應該清醒意識到，澳門1999年前的發展主要由外來力量所推動，其發展模式也基本上是在中葡兩國的默契和共識中形成的，是否適應回歸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新形勢，是否最有利於打開和形成特區發展的新格局，頗值得我們在特區成立十周年之際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探討。

澳門回歸以來，連續幾年的跨越式發展，為未來奠定了相當牢固的基礎，與此同時，各種新問題陸續湧現，深層次矛盾先後顯露，如何達成共識，制定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凸現澳門在區域中的地位，已經是每個澳門人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正因為我們目前處於向前邁進的十字路口，就更加迫切需要重溫這段歷史，以便儘快理清日顯零亂的思緒、儘早調整日漸迷失的心態，不懼風雨艱辛，朝向美好的目標，邁出堅定不移的腳步。因此，濟修兄大作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價值不菲的參考文本。作為一個讀者，對他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也正因為這種敬意，當他囑我作序時，便欣然應允，並且希望他有更多佳作問世，不斷地喚醒我們漸漸淡去的記憶。

吳志良

二〇〇九年三月

前言：關於當代澳門歷史時期的劃分

澳門，猶如雙面神，又如硬幣的兩面，處處呈現著她的兩面性格。她有一個中國人的稱呼——澳門，又有一個洋名——Macau；同一條街道，往往既有中國人的叫法，也有西洋的名字；就連居民的名字，不少華人和葡人，也都同時有中文名和外文名。甚至連澳門的歷史，也是一邊與葡國歷史有關，一邊與中國歷史相連。中國和葡國的因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澳門，對於中國來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後來被葡萄牙逐步佔領；對於葡萄牙來說，先是十六世紀中葉莫名其妙地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一個由葡人自治組織“議事會”進行內部管理的一個“番坊”，後是1844年4月20日被認定是海外殖民地的一個“省”，1974年後承認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縱觀整個澳門歷史，澳門的地位與歸屬，鴉片戰爭之前毫無爭議是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政權都屬於中國政府；鴉片戰爭後至葡國1974年“鮮花革命”前這段時間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對澳門實際行使主權；從“鮮花革命”以後至回歸中國之前，澳門成為有限度自治的葡管地區；澳門回歸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由此可知，澳門在回歸前，一直受到中國和葡萄牙兩個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因此，論述澳門的歷史，就不能離開中葡兩方面的因素：

從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據居澳門、成立議事會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前，澳門的主權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而在管治方面，雖然是由中國政府管治，但實際上也允許葡人內部自治。其自治有明顯的政權性質，包括內部選舉官員、檢察官，由葡人自己管理；葡人如犯罪，就由葡人內部自己審訊及治罪。澳門葡人的自治權是由議事會掌握的，他們既聽命於葡萄牙王朝及其代表葡屬印度總督，又要服從中國明清王朝。根據歷史學者吳志良分析，這段歷史時期的澳門政治制度是雙軌的，混合型的或分治型的。這段歷史時期，對中國來說，是澳門的明朝和清朝時期；對葡萄牙來說，是澳門的議事會時代。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清朝的中國官員被趕出澳門，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半島，之後又佔領了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澳門治權全部由葡萄牙控制，葡萄牙並對澳門實際行使主權。同時，在澳門內部，議事會已經被葡萄牙主權代表的澳門總督奪了權，淪為市政機構。議事會時代終結了，澳門由葡萄牙當局通過總督直接管治。從那時至葡國“鮮花革命”前這個時期，是屬於澳葡殖民時代。而從中國方面來說，這段時期是晚清（近代）、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現、當代）。具體地劃分，從鴉片戰爭時期到191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晚清時期，是澳門的近代。1910年葡萄牙成立共和國，在中國，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也建立了民國；中國和葡萄牙幾乎同一時間開始採用共和制度，開啟了澳門的現代時期。這就是說，澳門從1910年以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可劃分作為現代，之後屬於當代。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發生了“鮮花革命”，新政權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由葡萄牙管理，不再將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從那時到澳門回歸中國這段時間，是屬於葡管時代。隨著中葡建立外交關係和中葡就澳門問題簽署聯合聲明，在這個時期（葡管時代）的後半段，澳門進入回歸中國的過渡期，各方面的政策、建設、工作等都要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要與《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要圍繞澳門回歸這一中心，因此，中國方面的影響在這時期是非常的大。

葡萄牙發生“鮮花革命”後，澳門的政治地位發生了變化，葡萄牙新政府於1976年頒佈《葡萄牙共和國憲法》，首次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並於同年頒佈了新的《澳門組織章程》，給予澳門有限度的自治。之後，

澳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政治上，澳門成立了第一個包括有直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中葡兩國於1979年建交，1987年又就澳門問題達成了協議，同意澳門於1999年回歸中國，自此，澳門進入了長達十多年的政權交替的過渡期。在經濟上，澳門經濟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開始起飛，出現了現代工業，形成了出口加工業、旅遊博彩業、地產建築業、銀行金融業四大經濟支柱。值得指出的是，由於澳門在回歸後要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因此，以法律形式將這方針具體定下來的《澳門基本法》，蕭規曹隨，基本上保持了澳葡時期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等，甚至政治和行政的結構，保持回歸前殖民地的大部份安排及管治形式。從《澳門基本法》中可以看到《澳門組織章程》的影子。也因此，即使澳門回歸了，葡萄牙在澳門的影響可以說是不小的。

而中國方面，1976年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兩年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進入了長達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國大陸在這個時期對於澳門的影響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對於澳門來說，是個歷史轉折點。也因此，《當代澳門透視》所說的當代，指的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這個時期，直至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五年。由於第二屆特區政府及特區的政治社會情勢還有待觀察，因此本書的資料基本上到第一屆澳門特區政府結束的2004年年底為止，但並不是說“當代”到此為止。

必須說明的是，對於澳門歷史時期的劃分，歷史學者有不同的劃分方法，本書採用吳志良博士的方法，即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作為澳門的“當代”的開始。畢竟，那時葡萄牙發生的“鮮花革命”，以及之後頒佈的新《澳門組織章程》，對於當代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甚至《澳門基本法》中的許多安排就是採用自《澳門組織章程》的，從而將繼續影響澳門回歸後的50年。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對於澳門來說，是個歷史轉折點。中葡兩國的關係在葡萄牙“四·二五”鮮花革命之前一直不大好，尤其是發生在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以當時的澳督簽署“認罪書”而告終，更使得葡人感到受到奇恥大辱，中葡兩國的關係降到冰點，葡國一度想放棄澳門。葡國

牙“四·二五”革命後的新政府，採取了與中國友好的政策；那時中國也結束了文化革命，正在消除“極左”思潮的影響。葡萄牙新政府表達了歸還澳門的意願，但中國政府以時機未成熟為由婉拒了。雖然如此，兩國的關係還是很快恢復起來，“四·二五”革命後的歷任澳督，也根據葡萄牙國策，推動與中國友好的政策，經常到中國訪問，與鄰近的廣東省加強合作。中葡關係的友好，也使澳葡政府改變了以前對於澳門採取消極的、只是維持現狀的政策，而開始積極地發展澳門，對澳門的行政管理進一步加強，不斷改革行政機構，建立了文官制度；經濟也不斷發展，七八十年代的澳門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社會方面，公共房屋、社會保障、勞工法、免費教育、公共衛生醫療等制度是在那時建立的；在基礎建設方面也作出很大的努力，不少大型建設就是在澳門回歸中國的過渡期中進行的。如果人們不以“陰謀論”來看待，公允地說，澳葡政府為澳門的繁榮安定出了不少的力量，希望能“光榮”地撤退。

可以說，葡萄牙“鮮花革命”之後引進澳門的民主思想，以及中葡關係的改善，大大地影響了當代澳門的發展。

本書根據該段時期的報刊披露的資料和檔案文獻，分章節敘述1974年“四·二五”鮮花革命後李安道、伊芝迪、高斯達、馬俊賢、文禮治和韋奇立等各任澳督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澳門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期間發生的變化，同時也對一些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人口和澳台關係等問題進行整理、綜述和分析，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當代澳門30年來政治、經濟和社會演變的脈絡。如上所述，澳門在回歸前，中國和葡國的因素交織在一起，一直受到中國和葡萄牙兩個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因此，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當代澳門的重要事件，都撇不開中葡兩方面的因素，尤其是：葡萄牙新政府於1976年頒佈《葡萄牙共和國憲法》，首次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同年頒佈新的《澳門組織章程》，給澳門予有限度自治；中葡兩國建交，之後的各任澳督推動與中國友好的政策；中葡兩國就澳門前途問題簽署聯合聲明，同意澳門於1999年回歸中國；《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澳門自此進入了長達十多年的政權交替的過渡期。

另外，本書作者作為記者，在澳門回歸三年時就當代澳門的一些歷史事件

訪問了前澳門政府高官黎祖智。當時黎祖智在澳門已擔任了近25年的行政公職，其中有13年在澳門政府工作，尤其是參與了澳門回歸中國的過渡期內澳門政府的決策。對於當代澳門這段歷史，黎祖智無疑是個重要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作者根據錄音整理過那次訪問的內容，並且發表在澳門《正報》上，此次將它附錄於書後，供讀者參詳。

本書儘量努力實踐克羅齊所倡導的歷史研究的方法：“歷史不推尋法則，也不形成概念；它不用歸納，也不用演繹，它只管敘述，不管推證；它不建立一些共相和抽象品，只安排一些直覺品”，“歷史只能把拿破侖和查理大帝，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法國革命和意大利統一，當作具有個別面貌的個別事物再現出來”（《美學原理》第三章）。不過，限於資料和作者的水平，錯誤遺漏在所難免，還望四方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目錄

序 言	1
前 言 關於當代澳門歷史時期的劃分	5
第一章 帶來葡國民主革命思想的李安道時期	001
一 葡國“鮮花革命”後的澳門	001
二 葡兵撤走，澳門不駐軍	006
三 《澳門組織章程》的誕生	007
四 首個有直接選舉的立法會產生	011
五 葡國總統首次諮詢澳門總督人選	014
六 李安道政績評說	015
第二章 中葡建交促進澳門穩定的伊芝迪時期	019
一 伊芝迪將軍就任澳門總督	019
二 葡萄牙與中國建交	023
三 伊芝迪榮升總參謀長離任返葡	025

第三章 進入現代化發展的高斯達時期	029
一 澳門地方葡人勢力與總督的權力之爭.....	029
二 高斯達鐵腕解散立法會.....	038
三 推動澳門現代化發展的高斯達施政.....	050
四 公共房屋制度的完善.....	054
第四章 文人總督馬俊賢時期	057
一 上任僅一年的文人總督馬俊賢.....	057
二 中葡建交與關於澳門前途的談判.....	060
三 中葡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066
四 澳門基本法的起草.....	075
第五章 涉貪污醜聞而辭職的總督文禮治	079
一 文人總督文禮治.....	079
二 新的市政自治機構的建立.....	083
三 勞工保障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087
四 醫療衛生系統的完善.....	089
五 爭議不斷的輸入外地勞工政策.....	092
六 首個因涉貪污醜聞而辭職的總督.....	097
第六章 處澳門政權過渡的韋奇立時期	103
一 末任總督韋奇立.....	103
二 《澳門教育制度》法律的誕生和免費教育.....	106
三 澳門國際機場的興建一波三折.....	113
四 “一二·三”事件催生協商政治及社團政治.....	121
第七章 過渡期三大問題的解決	127
一 公務員本地化.....	129
二 法律本地化.....	137

三 中文官方地位的落實·····	145
四 三大問題的解決並不如意·····	150
第八章 後過渡期的治安和經濟問題·····	155
一 後過渡期的社會治安問題·····	155
二 駐軍澳門引致葡方不滿·····	160
三 後過渡期澳門經濟衰退·····	166
四 聯絡小組在順利回歸中扮演重要角色·····	168
第九章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	173
一 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	173
二 何厚鏵當選首任行政長官·····	177
三 澳門特區政府的籌組·····	183
四 澳門政權順利交接·····	188
第十章 兩岸影響下的澳門與台灣的关系·····	199
一 “一二·三”事件迫使台灣政治勢力退出澳門·····	199
二 大陸對台政策轉變與兩岸關係的緩和·····	200
三 台灣官方機構在澳門恢復設立·····	203
四 “錢七條”為澳台關係定調·····	206
五 台灣機構和政策因應澳門回歸作調整·····	208
六 台灣駐澳門機構名稱的風波·····	214
七 澳台兩地交往·····	216
八 澳台航線與澳門的特殊作用·····	219
第十一章 澳門人口的變遷·····	225
一 合法移民的困擾·····	226
二 非法移民與大特赦·····	229
三 澳門人口的起伏變動·····	242

第十二章 當代澳門四個經濟支柱	247
一 澳門經濟概況.....	247
二 葡國及中國內地企業到澳門發展.....	251
三 紡織品配額制度推動製造業發展.....	255
四 博彩旅遊業一枝獨秀.....	258
五 銀行金融業逐步發展.....	265
六 房地產建築業發展高低起伏.....	273
七 回歸後澳門的經濟發展政策.....	275
第十三章 “澳人治澳”的何厚鏵時代	279
一 特區成立之初遇到的挑戰.....	279
二 博彩業結束獨家經營走向開放.....	284
三 回歸後澳門經濟迅速發展.....	289
四 回歸五年特區情況基本好轉.....	297
五 何厚鏵連任第二任行政長官.....	299
跋	303
附錄 訪問黎祖智先生	309

第一章

帶來葡國民主革命思想的李安道時期

一、葡國“鮮花革命”後的澳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非殖民地化運動風起雲湧，世界各地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當時葡萄牙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獨裁政府卻不肯放棄殖民政策，並為此在非洲打了十多年的殖民戰爭。戰爭使葡萄牙的經濟陷於崩潰邊緣，引起國內局勢動蕩。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終於爆發了史稱“鮮花革命”的軍事政變，原任葡萄牙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的斯皮諾拉將軍率領一些不滿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的、年輕的中下級軍官為主的“武裝部隊運動”軍隊，發動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薩拉查總統的獨裁統治。薩拉查和總理卡塔諾被放逐到馬德拉島。“武裝部隊運動”發表的聲明說，經過在海外進行的13年戰鬥之後，“當前政治制度已經不能夠確定一種導致各種族和信念的葡萄牙人之間的和平的海外政策”。

葡萄牙軍事委員會主席斯皮諾拉組成的軍政府，在第二天宣佈解除在葡萄牙和海外各“省”的所有總督及內閣所有成員的職務，同時宣佈“徹底改革”，包括解散政治警察，在一年內舉行國會選舉，然後恢復憲法統治，廢除新聞檢查，釋放政治犯等。